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62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6,000册

书号11310·10 定价1.0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陈 云 (1)

回 忆 录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维汉 (6)

山西抗战的回忆 任弼时 (53)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 吴玉章 (70)

解放长春 肖劲光 (92)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122)

艳晚事件 宋 黎 (139)

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

军的统战工作 徐以新 (160)

回忆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成长

历程 陈 健 梁威林 (169)

专 题 调 查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江苏、
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

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江苏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合编(181)
浙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

.....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45)

大连“福纺”厂罢工始末

.....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55)



怀念黄道同志..... 方志纯(285)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的经过

..... 郑建英(296)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

陈 云

编者按：《辽沈决战》一书原系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计划编辑的一本战役参加者的回忆文章汇编。陈云同志在该馆来函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时，就这本书的编辑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到具体编辑办法谈了一系列意见。谈话整理成文字后，经陈云同志阅改过。这篇谈话不仅对认识和研究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党史研究工作和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现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在本刊发表。发表前，陈云同志对个别地方又作了修改、补充。目前，《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积极地进行着。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

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一本回忆这个战役的书是必要的，这对于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义。

但是，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当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当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约十一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

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再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第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第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第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它拥有不少比较好的产粮区，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还拥有沟通各地的铁路和一批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

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总之，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因此，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比如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东北局一九四六年的“七·七”决议。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比如黄克诚、谭政、韩先楚、程世才、彭嘉庆、贺晋年、吕正操等部队干部，张秀山、王鹤寿、范式人、郭峰、赵德尊、张启龙、江华、王首道、李运

昌、陈雷、王一知、钟子云等地方干部的文章。还可以请林月琴同志写一篇回忆罗帅的文章。这样，人们就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本原因。

为了把这本书改编好，可以请几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张秀山、王首道、马洪和韩先楚、刘震他们来主持编辑工作。还可以把这本书的编辑做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它合编。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同志把关。

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不过，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 维 汉

编者：李维汉同志嘱我们转告读者，对本文“敬请提出批评建议”。

我现在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情况和主要工作，根据个人回忆并参考文献记载，作一简要论述。

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我们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基本结束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面临着三种情况：

一是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加强了反动统治，使我们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三十一、二万人^①。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都被打散或被打入地下。

二是革命力量逐渐恢复。我看过一九二八年六月三

十日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这个材料说，自宁汉反动后至党的六大，我们党领导过的重要罢工约四十七次，参加罢工的群众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多人。同时，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的暴动约有九十四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三十四万多人（两广的数字未计入）。其中，有二十六处成立了县苏维埃，三十一处成立了乡苏维埃。此外，还有许多自发斗争^②。在这些斗争中，特别是经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建立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到召开六大时，全国共有省委十六个，南洋临委一个，特委三十七个，县委四百个，市委三十六个，区委四十一个，特支一百三十八个^③。党员人数已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上升到四万多人。这个数字是目前许多同志的一种估计。恩来在党的六大大会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说，全国党员人数为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但他同时指出十三万多人这是“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一九二九年六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发展到七万三千多人。因此，在召开六大时，党员人数已在上升，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是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

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正确地澄清和解答，否则便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却要无产阶级来领导，怎样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问题，当时许多人还搞不清楚。加上陈独秀散布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彭述之鼓吹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天然的领导权，当时虽然对这些错误论调进行过批评，但没有从理论上完全弄清楚。六大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更搞乱了我们党内的思想。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当时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又如革命形势问题。当时到底是高潮还是低潮，许多同志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再如在斗争策略上，当时是应该退却还是应该继续进攻？如果是退却，那么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不可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在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性质，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迎击敌人的残酷进攻，领导革命胜利前进，在八七会议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规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派五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至于六大的议程，决议规定为：国际代表报告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和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和策略；土地问题党纲；革命工会的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出

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后来，由于情况的发展变化，代表产生办法和大会议程都有所改变。

到了一九二八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三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关于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上述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四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选举法进行选举。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究竟有多少，我记不准了。我记得的代表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刘伯承、向忠发、张国焘、蔡和森、关向应（共青团代表）、阮啸仙、周秀珠、霍锐鏞（湖北代表）、刘义（湖南代表）、李子芬（共青团代表）、余茂怀、夏曦、李立三、邓颖超、张昆弟、罗明、杨之华、蔡畅、邓中夏、项英、罗章龙、王仲一、任旭、王凤飞、黄平、王灼、杨殷、胡锡奎、毛简青、王藻文、华少峰、徐锡根、何资深、王若飞、唐宏经等人。上述名单中有些名字有待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证实，未能回忆出来的名字，也有待查证。

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二是没有让一些从事实际

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并在党内享有声望的同志参加六大。关于这两条，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作的评论。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六大的组织准备工作。下面再说关于六大的政治准备。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就指定专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十一月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这一草案，提出书面的修改意见，同时要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和材料随时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以待六大作最后的决定。后来，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可能参考过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接着，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并经过斯大林等修改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六大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势、党的工作中心、党内所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等等，在这个决议案上都有阐述。

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为向六大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写成的。它叙述了一九二五年至六大前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阶段，总结了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原则地提出党的五项任务，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一读。但是这个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估量，继续坚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坚持城市中心和加紧准备总暴动等“左”的错误。

对召开六大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由上海去莫斯科的代表，一般都是经大连、哈尔滨，在满洲里下火车，于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瞿秋白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楚，据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里说，他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离沪出国”的。

秋白、恩来到达莫斯科后，继续为大会的召开进行准备工作。开会前，斯大林又找部分代表谈了话。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大会于六月十八日下午正式开幕，七月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四天。

六大期间留守中央的工作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